

北京人第一头盖骨发现 六十年文集

*60th Anniversary Essays for Discovery
of the First Peking Man's Skull*

主 编： 周国兴

副主编： 阮南武 段瑞华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083

7

1

序.....	贾兰坡	(1)
裴文中先生在史前考古学上的贡献	安志敏	(3)
裴文中教授与关于史前日中古人人类之联系的研究	二宫淳一郎	(7)
裴文中教授在考古人才上的贡献	吕遵谔	(8)
裴文中论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和地层学	韩德芬	(12)
裴文中教授与广西史前考古学	易光远	(17)
裴文中教授对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贡献	甄朔南	(20)
怀念裴文中理事长	许维枢	(24)
裴文中教授对博物馆事业的贡献	黄为龙	(26)
难忘的回忆	常延年	(27)
裴文中教授与南通博物苑	许振国	(28)
怀念我的老师	黄培华	(30)
“北京人”是世界文化及古生物遗产	潘 江	(31)
中国西南晚新生代环境造就人类起源和演化的重要条件	黄万波	(33)
记河北兴隆发现的纹饰鹿角	尤玉柱 王 峰	(38)
元谋人胫骨化石研究	周国兴 王 波 翟 红	(41)
沂沭河流域十年来的旧石器考古发现	徐淑彬	(45)
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及其遗址年代的电子自旋共振测年研究	黄培华等	(56)
吉林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姜 鹏	(57)
云南史前考古四十年的主要收获	李昆声	(66)
论人类起源的根本因素		
——评周国兴先生有关人类起源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发展	张鸿奎	(73)
是劳动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劳动?	周国兴	(79)
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雕刻画	王炳华	(84)
火耕农业	宋兆麟	(98)
河北地区距今 9000 年核桃果核	张元真	(110)
裴文中先生传略(1904—1982)	安志敏	(113)
裴文中处长在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上的讲话	汪禹平	(115)
北京人大事记(1918—1989)	张元真	(118)

记燕京大学史前陈列馆	成恩元	(123)
北京自然博物馆藏北京地区(周口店除外)		
晚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	甄朔南 关 键	(127)
宁夏同心发现的矮脚犀化石	关 键 李朝进 关淑琴 李春兰	(134)
关于占祥上猿(<i>Pliopithecus zhanxiangi</i>)的讨论	关 键	(138)
关于板齿象数理分析的初探	关 键 宋汝芬	(144)
宁夏同心中新世犀类研究	关 键 张宝堃	(151)
后记	周国兴	(165)

Contents

Preface	Chia Lanpo (1)
Pei Wenzhong' s Contribution to the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An Zhimin (3)
Pei Wenzhong and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Prehistorical age	Junichro Ninomiya (7)
Pei Wenzhong' s thesis about Quaternary mammalian zoology and stratigraphy	Han defen (12)
Pei wenzhong and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of Guangxi Province	Yi Guangyuan (17)
Pei Wenzhong' s contribution to the Cause of Chinese Museums	Zhen Shuonan (20)
In memory of Pei Wenzhong — the late president of Chinese Association of Natural Science Museums	Xu Weishu (24)
Pei Wenzhong' s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Museums	Huang Weilong (26)
Unforgettable Memories	Chang Gannian (27)
Pei Wenzhong and Nantong Museum	Xu Zhenguo (28)
Cherishing the Memory of teach — Pei Wenzhong	Huang Peihua (30)
"Peking man" the Cultural and paleaological Heritage of the World	Pan Jiang (31)
The enviromment of late Cenozoic in Southwestern China bring about the origination and evolution of Human	Huang Wanpo (33)
Note on the analter with engraving ornament found in Xing Long County, Hebei Province	You Yuzhu Wangfeng (38)
New Material of Yuanmou Man — the fossiltibia from Guojianbao Site	Zhou Guoxing et. al (41)
Palaeozoic Discoveries in Yishu River valley during last decades	Xu Shubin (45)
Study of ESR dating for buring age of the first skull of Peking Man and Chronological Scale of the Cave deposit in Zhoukoudian Site Loc. I.	Huang Peihua et. al. (56)
Palaeozoic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Studies in Jilin Province	Jiang Peng (57)
The Main Achievement of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in Yunnan Province for last 40 years	Li Kunsheng (66)
The basic factors in the Origin of Mankind	Zhang Hongkui (73)
Was man created labour, or labour was created by man?	Zhou Guoxing (79)
Rock—engraving on Worship of reproduction in Shimenzi, Kangjin, Hutubi County, Xinjiang Province	Wang Binghua (84)
Agriculture of Slash and Born Cultivation	Song Zhaolin (98)
9000—year—old nutlets of Juglans in Hebei	Zhang Yuanzhen (110)
Pei Wenzhong' s brief biography	An Zhimin (113)
Note on the Speach on the 2nd training course of Archaeologists by Pei Wenzhong	Wang Yuping (115)
Chronicle of events in Zhoukoudian	Zhang yuanzhen (118)

Note on the prehistoric History Museum of Yanjing university	Cheng ng yuan (123)
Fossil mammal Collections of Beijing Natural History Museum from upper Pleistocene of	
Beijing area ououtside Zhoukodian Region	Zhen Shuonan GUAN, Jian (127)
The Miocene Brachypotherids from Tongxin, Ningxia	GUAN, jian et. al. (134)
A discussion on <i>pliopithecus zhaoxiangensis</i> from Tongxin	GUAN, jian (138)
A Remark on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shovel—tusk	
mastodonts	GUAN, Jian, Song Rufen (144)
The Middle Miocene Rhinoceros from Ningxia	GUAN, Jian, Zhang Bao kuen (151)
Postscript	Zhou Guoxing (165)

序

说裴文中先生是古脊椎动物学家,那是因为他首先发表了《周口店猿人产地之肉食类化石》(1934年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8号)。在这本巨著里,他描写了当时所发现的5科近30种肉食类。在那个年月里,中国人还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古脊椎动物,绝大多数的人,还拿它当作一味中药——“龙骨”吃。是他代表中国人首先写出200多页有关肉食类的论著。这本书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关于北京人遗址的重要著作之一。

我认为说他是位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则更为恰当,因为中国人第一篇有关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的文章是他首先发表的。当北京人遗址发现很多外来的脉石英石片之后,是他首先辨认出是属于人工制品,并将它们进行了分类,写成《周口店洞穴堆积中国猿人层内石英器及他种石器之发现》一文(发表于《中国地质学会志》1932年第11卷104—146页)。他还研究了北京人遗址中的骨器,写出《周口店骨器之几种》(发表于《中国地质学会志》1933年第12卷105—112页)。这两篇文章是中国人首先发表的有关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成果。

他在《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1934年《地质专报》乙种第7号)一书中曾写道:“我们由鸽子洞原来的底,沿着北边石灰石,向下开,开了有8米深,遇到一层红土和黑土。这几层之中,碎骨很多,破碎石英也很多,并有许多烧的兽骨及猿人的牙床及锁骨,叫作猿人层炭地。这一层出产的东西,最令人注意的是石英,石英本来不当产在石灰石山中,为什么这样多?于是我想到了人力所搬运而来。搬运作什么用?不用说,作石器。我们除了有石英石器外,尚有砂岩制作者,砂岩的材料,多半是河床上的河光石。”

我是1931年发掘鸽子堂的时候参加周口店工作的。当时虽然什么都不懂,但对发掘很感兴趣。一有时间就跑到那里跟着技术工人学习发掘。技术工人对寻找脉石英很有经验,发掘灰层时每一小钢铲或小钢钩掘下去,只要听到咯吱一响就知道是碰到石英了。我不仅在洞里学习发掘、包标本、写编号,还和裴先生学习石器分类。可以说是我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始。

有些不懂野外工作的人,对于“发现”并不感到重要,但由于我经常到田野工作,深知标本的来源不易:“没有发现,也就没有研究”是很衷肯又深得其味的一句话。当1929年11月2日裴先生发现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时,所花费的精力确实不少,因他的发现所解决的学术问题是很大的。当20年代初期,尽管法国学者德日进(P. Teilhard de Chardin)和桑志华(E. Licent)在甘肃省庆阳、宁夏灵武县水洞沟及内蒙古的萨拉乌苏已有旧石器时代石器发现,但并未得到多数学者所承认和注意。在地质学家章鸿钊先生于1927年发表的《石雅》(《地质专报》乙种第2号)一书中,还说:“我国石器之出于地下者,皆不多觐,据曩时外人所得,率皆磨砢光滑,有类新石器时代之物。”在这著作中还

引劳弗(H. Laufer)著《中国古玉考》所说的:“凡中国所出石器, 率皆磨制, 具稍精良者, 尤非率尔为之。方之欧美埃及印度有史以前之物, 略与新石器相仿佛, 若旧石器, 中国概未尝见焉。”

裴文中先生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骨的功绩更是不可泯灭的, 因为它代表人类学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此可以举如下的例子来说明: 1856年在德国霍特达尔(Hochdal)附近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以东135公里处的尼安德特山谷(Neandertal valley)发现尼安特人化石之后, 就有许多学者反对对这一发现的解释, 不承认是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alensis), 连德国著名的病理学家微耳和(R. L. K. Virchow)都认为是畸形的人骨, 直到1901年施瓦尔贝(G. Schwalbe)发表论文, 才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还有荷兰的军医解剖学家杜布瓦(Eugene Dubois)于1891~1898年在爪哇中部的雅维(Ngawi)以西115公里的垂尼尔村(Trinil)火山层中发现了头盖骨和大腿骨等化石, 1894年被杜布瓦命名为“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 很遭受到一些人们的反对。当他返回他的祖国的时候, 许多科学家对他的发现持反对态度, 甚至有人进行强烈反对。杜布瓦在一气之下, 竟然把它的发现锁在他家乡博物馆的保险柜里, 一锁就是28年。后来美国史密森研究院著名的人类学家赫尔德力卡(Ales Hrdlicka)等才得一见, 证明是古代人类的遗骸。

北京人遗址的发现在学术上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 是因为发现的人类化石个体之多, 和代表部位之全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特别是从同一遗址中还发现了石器、骨器和使用火的遗迹——灰烬、烧骨和烧石以及上百种的哺乳动物化石。有了北京人遗址的发现, 才使人们不得不相信直立人为“从猿到人”的中间环节。这一发现也挽救了过去的许多发现, 使人确认了“人的来源”的真正道理。北京人的第一个头盖骨、石器、骨器以及灰烬等都是裴文中先生首先辨认出来的, 他对学术上的功绩是显而易见的。

裴先生在学术观点上, 虽然有和别人许多不同的地方, 那是学术观点上的不同。我和他对某些学术上的看法就有相当大的差异, 比如对北京人是否是最早的人类问题, 在60年代之初我们的辩论长达一年多之久, 那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彼此之间的看法上的分歧。裴先生最使我敬佩的是他心胸开朗, 他的思想好像一潭清水, 明澈见底, 连其中的沙粒都使你看得清清楚楚。有事摆在明处, 不会耍手腕, 故弄玄虚,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当你不注意的时候, 从背后使绊子, 甚至捅你一刀。我最赞成他即使想打你一拳, 也打在明处。他还有个最大的优点是能吃苦耐劳, 对任何环境都能受得住, 禁得起, 绝不挑吃挑喝。我记得我们到甘肃戈壁滩旅行的时候, 老百姓擀的面条, 连我都觉得有点儿难下咽, 但他却一扒拉就是一碗。他在壮年鼎盛时期, 工作十分努力, 不论假期或星期日, 我和他待的年头很长, 特别是在周口店工作时期, 简直说未看到他很好的休息过, 是他培养我吃苦耐劳和奋发图强的习惯。

贾兰坡

1990年3月9日于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

裴文中先生在史前考古学上的贡献

安 志 敏

裴文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五十多年的研究生涯中，筚路蓝缕，为考古发现的积累，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新生力量的培养等方面，贡献了毕生的力量。从1928年参加周口店发掘工作起，开始迈进史前考古学的研究领域，以发现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化石而闻名于世。当我们提到中国猿人的时候，往往同裴文中先生的名字联在一起。这决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和先生的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和坚韧不拔的努力分不开的。广泛的田野实践和渊博的考古学素养、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是裴文中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的关键，并且许多创举已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纪念裴文中先生在史前考古学上的重大贡献，可举以下的几个课题作为例证。

—

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宝库，在这里发现约四十个体的中国猿人化石，其中有五个较为完整的头盖骨，还有十万余件人工打击的石片、石块和石器，用火遗迹以及大量的脊椎动物化石等，在其它旧石器时代遗址中罕与伦比。裴文中先生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首先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1928年当裴文中先生来到周口店时，不过是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开始时负责管理工人和账目，同时也参加发掘工作，次年即负责主持全面的发掘工作。在工作期间曾向杨钟键先生和德日进神父学习古生物的知识，并结合实践努力钻研，终于能够独立工作，并成为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在1929年12月2日发现了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化石，引起学术界的震动，从此周口店的发掘就为世人所注目。

旧石器和用火遗迹的确认，是继中国猿人化石之后的两项重要发现。但是旧石器的发现和确认，并没有马上为人们所接受，正像裴文中先生自己所讲过的那样：“1931年时，我在龙骨山的山洞中发现了许多石英。据我个人看来，是有人工打击的痕迹的，于是我采集了很多。带回北京，洗刷之后，陈列出来，请我们同事们来察看和研究，有一位同事，看了之后，好像是非常生气，立刻就拿起一块石器来在其余的石器上拼命地打，他口中说：‘这样的碎石头，马路上多得很多！’我自己耐心研究，再作试验，证明哪一块哪一个地方是有人工打击的痕迹，那一个地方是天然破碎的痕迹。我这样的研究，始终不能说服同事中的几位先生。后来于1931年秋，请来法国史前学的权威步日耶教授，经他的证明，同事们才信服了我的说法。”《《龙骨山的变迁》》这个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此以前，大批的石器和挖出的土石一起遭到被抛弃的命运，没有裴文中先生的敏锐观察，则中国猿人文化的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功绩，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也是应

该大书特书的。用火的遗迹为烧骨、烧石和木炭等，又经过化验分析确实证明它们经过火的作用，同时文化层中还有成层的灰烬和烧土，周口店属于中国猿人的居住遗址已经确凿无疑。

随着旧石器和用火遗迹的发现，裴文中先生意识到过去那种以挖掘动物化石为目的的方法不再适用了，于是转变到考古学方面来。从1932年起开始采用布方的方法，即在发掘的地面分成若干方格，每个方格9平方米，凡属重要的标本皆加以测量，一一绘在平面图和剖面图上，建立了完整的资料档案。这是周口店发掘中的一项重大转折，也是裴文中先生在中国史前考古学上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裴文中先生直到晚年还集中于中国猿人石器群的研究，对四十多米堆积中所出土的石器按层别进行整理、分类、观察、测量和描述，以归纳各层石器的一般性质，然后在分层研究和总体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猿人文化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作了明确的叙述。《中国猿人石器研究》(1985年)这部的专著便是裴文中先生对周口店发掘研究的最后贡献。

除了发掘中国猿人遗址(第一地点)之外，还发掘了第十三地点(1933年)、第十五地点(1935年)和山顶洞遗址(1933—1934年)，都有了丰富的收获，为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序列及体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建立以来，除在周口店继续有不少新的发现以外，还作过许多重要的田野工作，如四川资阳黄鳝溪资阳人化石地点(1951年)、山西襄汾丁村(1954)、宁夏灵武水洞沟(1963)、内蒙萨拉乌苏河(1963)、贵州黔西观音洞(1964年)等。资阳人是建国以来首次发现的智人化石地点，丁村文化和观音洞文化是华北和华南两种新的遗存，同中国猿人文化属于不同的传统。水洞沟和萨拉乌苏河的发掘，则着重于解决所谓“河套文化”的层位问题，结果证实：水洞沟包括旧石器和新石器两种层位，后者还含有磨制石斧和石磨盘等遗物，而过去的发掘是作为一个地层来处理的。至于萨拉乌苏河的石器地点却系河流冲击的再堆积，甚至混有数百年以前的陶片和瓷片在内，因此，两者的地层和文化性质都需要作重新估价，这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研究史上，也是相当重要的两项课题。

二

人类的诞生，开始了对自然界的改造，劳动手段遗物的研究是恢复社会生产的可靠物证。如何区别人工制品和非人工物，也就成为史前考古学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关键。在考古学史上曾出现不少的误谬，甚至今天还有人把非人工制品作为研究的对象，表明这个问题由来以久。裴文中先生对非人工的“假石器”和“假骨器”的分析研究，便是作为史前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来对待的。

早在周口店的发掘中，裴文中先生以敏锐的观察力，首先确认了石器的存在，并且开始实验，以期从岩石痕迹上弄清人工打击和自然破碎的区别。在法国留学期间，又根据步日耶教授三十多年来所搜集的自然破碎的岩石标本，并结合人工打击的实验，深入分析人类制作的史前石器与自然形成的“假石器”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史前人类使用的硬岩石的破碎和成形中自然现象的作用》(译文改名为《论史前石器和假石器》载《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1987年)为题的论文，获得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在中国这篇论文里详细分析由于温度作用和各种机械作用所产生的“假石器”，并通过实验所

表明的石器特征，以资同“假石器”相区别。欧洲的“曙石器”问题，在本世纪初叶曾引起激烈的争论，关键在于它们究竟是人工制品还是自然形成的，这不仅牵涉到如何理解人类文化的起源问题，还牵涉到如何分析对待理论方法的问题。这篇论文为“曙石器”的破产作了有力的注释，同时对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时至今日，许多自然作用形成的“假石器”，也往往会欺骗有一定经验的考古学家，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更加审慎，要充分考虑到史前人类活动同遗址、遗物的有机联系，不能把各种成因的“假石器”作为人工制品来对待。

非人工制品的“假石器”的分析研究，同样受到裴文中先生的关注。早在1931年步日耶教授来华考察时，主张中国猿人已能制作骨角器，并著有《周口店中国猿人的骨角器工艺》（1939年）一书，裴文中先生当时发表的论文中，曾同意上述的观察（1932年），后来经过重新分析，发现步日耶的所谓骨角器，实非人工所制作，乃在周口店发掘的标本和新生代研究室所藏标本的基础上，著《非人工破碎之骨化石》（1938年）一书，指出非人工破碎的骨化石成因，包括啮齿类动物咬碎的骨化石，食肉类动物咬碎的骨化石，以及骨化石上所呈现的食肉类动物的爪痕，腐蚀后所出现的曲纹，化学作用和水蚀作用中的变化等等，皆以实物标本为依据，经过细致的观察分析，并用实验作为佐证，因而非人工破碎骨化石的性质和特征也就更加明确了。该书与步日耶教授所著几乎同时出版，虽然观点相对立，事后却得到步日耶教授的赞许。当然直到今天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仍有人把破碎的骨化石作为骨器来对待，以致引起争论。因而这项研究的成果，对史前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体系和年代分期方面，裴文中先生也作了开创和深入的工作。1937年在美国费城举行的早期人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宣读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是中国学者首次发表的全面总结，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在这篇论文里列举早期的中国猿人文化，中期的河套文化和晚期的山顶洞文化，奠定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分期基础，并指出它们不同于欧洲的旧石器文化。建国以来又发表一系列的总结性论文，如《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和研究所》，1955年）、《旧石器研究》（《十年来的中国科学——古生物学》，1959年）和《中国的旧石器时代——附中石器时代》（《日本の考古学》1，1965年）等，都是根据新的发现和研究，不断扩充其内容并订正旧的认识，如用水洞沟文化和萨拉乌苏河文化来代替过去的“河套文化”，便是明显的一例。到目前为止，在论述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体系和分期时，均以上述的轮廓为基础，因而上述诸论文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裴文中先生从40年代起，便在总结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基础上，进而研究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力图建立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完整体系，从《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1948年）这本论文集，便可窥见其梗概。同时还著有《史前考古学概论》一稿，包括绪论、欧洲和中国史前文化，长达三十余万言，惜原稿在解放前丢失，仅绪论部分尚保存，即后来发表的遗稿《史前考古学基础》（1983年）一文。全篇共分六章，分别叙述史前考古学的定义、分类，地球的历史、人类进化和文化的发展，史前考古学的历史，有关遗址、葬地、人类和其它生物遗体以及石器、骨角器、陶器等研究资料，田野的调查，发掘、记录和保存，最后还讨论了史前考古学上容易出现错误及原因。尽管本文脱稿于四十

多年以前，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因为如此全面介绍史前考古学的基本知识和方法论的著作，不仅限于有志从事史前考古研究的青年同志，即使对于有丰富经验的考古工作者，也是十分有益的。

三

继旧石器时代之后，裴文中先生对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考古也作出许多重要贡献。

中石器时代的研究，是裴文中先生在国内首先提出的一个课题。1935年在广西武鸣的芭桥、芭勋、膳翔和桂林近郊的洞穴中，发现大批的打制石器和个别的磨制石器，而共生的动物群皆为现生种，于是提出这些遗存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尽管今天已把类似的遗存归诸早期新石器时代，当以该项发掘为最早，同时也不排斥在经济形态上还比较原始。1943年内蒙古札赉诺尔的调查试掘工作，明确肯定这里不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存，把该处和黑龙江省哈尔滨的顾乡屯都作为中石器时代来处理，并强调细石器在这个时期的作用。当时由于受到资料的局限，对细石器的起源和分布等论述虽不尽全面，但在上述论点的启示下，使考古界注意到细石器研究的关键。建国以来又在黄河流域普遍发现了细石器遗存，关于起源，时代和分布等问题都得到进一步的认识，对于裴文中先生的开创之功也不能不给予一定的评价。

甘肃、青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是空前规模的两次田野工作。1947年7—10月，在甘肃渭河上游的天水、甘谷、武山、陇西诸县，西汉水流域的临汾、临夏及兰州市附近作过三个月的调查和试掘，所发现的遗址共达93处。当年即编写出《甘肃史前考古报告初稿》，由地质调查所油印十数本分送全国各学术单位（已收入《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1987年）。在这篇报告的基础上，曾发表过一系列的论文，并写成《史前时期之西北》（1948年）的小册子，都引用了上述报告的内容和插图。这次发现丰富的史前遗址及其分布、分期等，均有利于今天的研究参考，还对过去的工作有所纠谬。同时也提出不少新的认识，如齐家文化的提出，便突破安特生所谓“六期”的体系，当时就明确指出，齐家文化不属于彩陶文化最早的一期，其年代可能晚于马家窑，而辛店、寺洼都受到齐家文化的影响。关于齐家文化年代的改订，与夏鼐先生的意见不谋而合（参照《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1948年）。1948年6—8月，又继续在甘肃河西走廊的永登、武威、民勤、永昌、张掖诸县和青海湟水流域的享堂、乐都、西宁和青海湖附近作过三个月的调查，对这一带史前遗址的分布、分期以及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等，均提出重要的认识。特别是沙井文化的命名，又是对安特生所谓“六期”体系的再次突破（《中国西北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的考古调查》1948年）。

在宏观地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余，裴文中先生还注意到某些器物的考古研究，1947年所发表的《中国古巴陶鬲及陶鼎之研究》便是一篇代表作。该文首先阐述三足器的定义、分类及有关部位的名称，然后分论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陶鬲、陶鼎及其演变趋势，并指出鬲、鼎的器形为中原文化的代表，至于边陲地区的变形鬲则受到黄河流域的影响，而时代也比较晚。上述的研究，是以考古资料为基础，以类型学方法为依据，打破了过去在古器物研究上的望器类比，树立了考古研究的典范。在国内是最早接触陶鬲和陶鼎的专题研究，并对后来的古器物类型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中国考古学

史上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可惜所著《中国古代陶器》一稿，已散佚无存，否则可为类型学的考古研究提供更多的范例。

在纪念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化石发现六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还必须缅怀裴文中先生在中国史前考古学上的重大贡献。本文只是概述裴文中先生五十多年考古生涯中的主要成果，而不可能概括其全部功绩。裴文中先生那种热爱考古事业为之奋斗不息，富于创造进取而忘我工作和奋勇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永远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主要参考文献

1. 《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1934年。
2. 《非人工破碎之骨化石》，1938年。
3. 《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1948年。
4. 《中国猿人石器研究》，1985年。
5. 《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1987年。

裴文中教授与关于史前期日中 古人类之联系的研究

二宫淳一郎

（日本·别府大学亚洲历史文化研究所）

北京人第一头盖骨的发现，中国自不用说，为整个亚洲古人类历史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其发现者裴文中教授的功绩是无法估量的。

1929年以来，历经六十年时间，有关中国古人类的调查与研究遍及全中国，所发现的资料贯穿着整个古人类时代。中国古人类研究立足于如此丰富的资料，已以其卓越的理论领导着世界学术界。人类之起源与发展的过程也即将因此而获得阐明。

然而，裴文中教授发现的世界珍宝北京人第一头盖骨及其后发现的众多贵重标本，亦由于日本的侵略而忽然下落不明。以至于我们今天再也无法一睹其神彩。作为一名日本人，我深感惭愧难已。

尽管如此，裴文中教授于1978年发表了《从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日的古交通》一文。裴教授在文中强调指出，事实说明，两国的古人类及其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为了进一步探讨今后之课题，需要加强和密切中日两国研究人员的合作和努力。

裴文中教授的论文发表以后，立即被翻译介绍到了日本（二宫：1980，1987）。日本曾于1949年在岩宿地方发现了黑曜石制的旧石器。然而由于当时普遍认为“日本不存在旧石器文化”，使得这一伟大的发现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1964年春，九州东部

早水台发现了石英脉岩制作的旧石器，更证实了日本旧石器时代的存在，可当时的学术界依然持否定态度。在这 的情况下，率先认识到了日中两国旧石器时代相互联系的就是裴文中教授。

后来，在日本各地陆续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数目已不下数千，从而不仅证明日本亦存在过旧石器时代，而且也使得史前期日中两国之古人类及文化交流的事实逐渐明朗化，这对解决日本人之起源与发展的问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特别是最近，在日本发现的人类化石日益增多，加之对动物化石的发现和研究，人类和动物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向日本的迁徙途径也已日渐清楚。裴教授曾指出，华北与日本列岛南端九州的连接，华北与日本列岛北部地区的交流是不容否认和忽视的。最近的发现和研究更有助于探明从华南经琉球而日本的途径。

我认为还有另一条渠道值得考虑，即经由长江古河道流域，打道琉球而至日本的渠道。

在距今约三万年以前，更新世晚期海水大后退之后，东海大部呈现为一片陆地。最近的中国古海洋学亦证明，这一时期的长江古河道遥处今天的上海滩以南，从黄尾屿与赤尾屿之间流入冲绳海槽，其古长江口正好与琉球宫古岛相望。从四川、湖北、安徽等省存在的古人类遗址来看，可以充分推测认为中国古人类是源自云南，然后顺长江流域北上东进的。这些古人类进而沿古长江流域南下或东进，很可能就分布到了琉球列岛和九州岛。

然而，目前尚无充足的科学资料来验证这一假说。裴文中教授所召唤的日中两国应该共同研究各种资料，特别是旧石器资料，古哺乳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并对其进行共同探讨和钻研，相信这将成为今后的课题。

裴文中教授在培养考古人才上的贡献

吕遵谔

(北京大学考古系)

裴文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是古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并在第四纪地质诸方面多有建树。同时，在培养考古人材方面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工作者。下面，就个人所知先生从事教育工作为培养考古人才所作的不可朽业绩，作一简单介绍，以表示对先生崇敬之意并勉励来者。

一、解放前的教学工作

通过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和到法国学习，先生深感我国考古事业亟待开展，而培养专业人才尤为当务之急。1940年秋，先生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史前考古学课程。这是先生从事教育工作的开始，是自法国归来开的第一门课程，也是我国大学开设史前考古课程的首例。先生曾说：“在中国，考古学虽然发达很早，但史前学之开始，也不过是近二十年之事；至于史前学列入大学课程之中，更是以本年在燕京大学始”^{*}。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巩固同学的记忆，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进行形象教学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先生一边授课，一边酝酿建立史前陈列馆。在当时历史系齐思和主任的支持下，于当年十月进行史前陈列馆的筹建工作。馆址设在镜春园。陈列馆是座北朝南的三间大房和两间小屋，陈列面积约120平方米，可以说是一座“袖珍陈列馆”。全部陈列标本由先生筹集。于1940年12月4日（差两天49年）上午正式开幕。有文记载：

“历史系史前古物陈列馆，经裴文文先生累月之筹备，已于1940年12月4日正式成立。馆中收集史前古物极为丰富。其中大部分为裴先生在周口店发掘所得者，于史前考古学上，尤有重要之价值”。**

史前陈列馆是袖珍式的，在职人员也很少。工人1名，秘书1名，先生为主任。别看这个陈列馆不起眼，却是先生从事博物馆事业的开始，为其以后从事宏伟的博物馆事业打下了基础。陈列标本今天看虽然不多，但在当时来说也算得上是“极为丰富”。它是当时全国大学中第一座史前陈列馆。其中有一批北京猿人的标本和许多实物以及制作极为精美的复制品，从北京人、河套人到山顶洞人可以乱真的模型和各种石器、装饰品和动物化石、烧石、灰烬等，显示了当时我国旧石器发掘、研究成果的一个完整系列，对史前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外，馆内还陈列了先生从法国收集的、代表欧洲旧石器时代几个大文化期的石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使学生们有比较、参考的资料。

1945年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恢复，将史前陈列馆改名为“史前博物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燕大合并于北京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迁入燕大校址，史前博物馆仍存，归历史系考古专业管理，1954年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充史前及以后各段考古标本，改为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标本陈列室。不久的将来陈列室的标本将进入新建的博物馆大楼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闭，先生的教学工作被迫停止。但他培养人才之心尤切，到北平师范大学地质系任教，为地质事业培养专才。1945年日帝投降后，地质调查所尚未恢复，先生又回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仍讲授史前考古学。1947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考古学，1948—1949年兼任中法大学讲授考古学课程，直到北京解放。

二、全国考古人员训练班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种建设项目纷纷上马。由于大规模经济建设，地下文物大量出土，急需文物考古人员进行清理和抢救，但是由于缺乏专门人才，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今日国家文物局前身）的领导们十分着急，而在1950年任雁北文物考察团团长

* 成恩元，记燕京大学史前陈列馆——兼忆裴文文先生，《大自然》1989年第3期。

** 燕京大学《史学年报》3卷2期，民国29年12月。

和东北考古发掘团团长的裴文中先生，通过对山西和吉林的文物调查和发掘工作，也深感培养考古人才的急迫性和重要意义。在急需考古人员的情况下，应采取应急措施培养人才。先生为壮大考古力量又积极奔走筹划，由社管局（裴文中先生为代表，当时他任博物馆处处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先生）和北京大学（向达先生）三个单位合办考古人员训练班。学习期限三个月，一个半月在京学习，一个半月到外地进行田野发掘实习。学员来自全国各省文物部门。训练班于1952年秋季开学，先生担任班主任并亲自授课和辅导田野学习。到1955年共办了四届，约400余人参加学习，毕业后回原派遣单位工作。这样，基本上满足了地方上的急需，各省能自己解决和处理基本建设中出土文物的抢救和发掘工作，使我国考古事业出现了一个新的面貌。这些学员毕业后回到地方去大部分成为各地考古工作的骨干，目前都在考古第一线积极工作，其中不少人担任过或尚在担任文物考古的领导工作。

三、考古学进入大学，培养专门人才

尽管从1940年开始裴文中先生就在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中法大学等讲授史前考古学和考古学的课程，但是使考古学这门学科进入大学，由大学直接培养考古专业人才却是我国考古界老前辈梦寐以求的事情。解放前虽有所议论，但由于社会条件和各种原因终未能实现。1952年春夏之交，中国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裴文中先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梁思永先生）和北京大学（向达先生）共同发起在北京大学成立考古学系，得到系主任郑天挺先生的大力支持。但是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在当年秋季先在历史系成立考古组。当时学员只有5人。1952年底考古组扩建改为考古专业，仍设于北大历史系。专业主任聘请考古研究所苏秉琦先生担任。当时只有教员4人，职员3人，工人1名，教学力量很单薄。聘请考古研究所和文物局有关专家任兼职教员。从专业建立起裴文中先生即领导考古专业石器时代考古教研组。当时先生任社管局博物馆处处长，工作繁忙，但仍定期召开教研组会议并亲自讲授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领导同学的实习。先生对考古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十分关心，尤其是对石器时代的教学和研究更为关切，花费大量时间编写教材，按时授课。当时没有专车接送，先生都是从城里挤公共汽车（当时公共汽车数量也很少）赶到城外来校上课，从不缺席。先生讲课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并以具体事例辅证讲课内容，使学生能生动活泼地学习。先生教学十分认真，耐心负责，就是在课间休息时，周围也围满了同学，提出各种问题，先生从不厌烦，总是耐心地解答问题。因此教学效果很好，得到同学的好评。更重要的是先生不但教学，而且育人，结合讲课的内容对学生进行专业思想教育。他常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和学生畅谈旧中国考古工作的艰辛，外国的所谓学者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指出中国考古学的光明远景，要求同学们为国家争光，奋发自强，为民族努力学习。在先生的谆谆教导下，同学们都热爱考古事业，毕业后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的考古事业做出了贡献。

先生在教学过程中深感参考资料、标本对学生巩固课堂学习、加深记忆的重要性，于1954年初将其个人所珍存的有关旧、新石器时代等图书120余册和实物标本470余件慷慨地赠送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图书中有先生的老师步日耶的手稿和精美的洞穴艺术、石器标本，代表了欧洲旧石器时代初、中、晚各个文化期，模型多为欧洲旧石器时代的

艺术品。这些图书、石器和模型是先生在法国学习时收集的，是国内唯一的一批珍贵资料（古脊椎所存有几件石器），由此，可以看出先生对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支持。先生赠送的这批珍贵图书和石器标本，我们专柜保存和陈列，对我们的教学和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回忆当时先生慨赠自己心爱的图书和石器标本的情景和当时在场的诸位先生激动心情恍如昨日之事。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我们将世代地妥善地珍存这批资料，并充分地利用，让它发挥应起的作用。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考古的需要，原设于历史系的考古专业于1983年扩建为考古系，目前教、职员60余人（其中教员40余人）。本科毕业生635人，研究生30人（1名博士生），本科留学生20余人，外国高级进修生56人（包括英、德、法、意、瑞士、芬兰、荷兰、丹麦、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东德、朝鲜和越南等20余个国家）。毕业生分配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做出应有的成绩，其中不少人担任省文化厅、局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省市博物馆的领导工作。除北大考古系以外，全国尚有十一所院校有考古专业，其中不少专业的领导人是北大的毕业生。所有这一切都和考古界老前辈和先生的重视人才和关心考古事业是分不开的。

可告慰先生的是先生在世时的石器时代教研组已扩大为旧石器古人类和新石器时代两个教研室。先生生前叮嘱我们要提高旧石器时代研究的水平，必须做踏实的基础工作，对骨器和石器要做模拟实验，通过微痕的观察分析对比，以了解其制作工艺过程和使用方式及使用效率。我们于1984年建立了旧石器时代实验室，购置精密的多功能的、电脑控制的高倍显微镜和有关仪器。已经做过并仍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老师和研究生写出了14篇实验考古学的论文，最近将发表6篇。

旧石器和古人类教研室有四名教员。已毕业专攻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硕士学位研究生13人，他们都在大学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博物馆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教学和研究工作。先生可以放心的是他们都很热爱旧石器考古，工作很积极努力，对我国旧石器考古事业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

1984年秋，我们在辽宁营口金牛山发现了一批国内外罕见的人类化石，他处于由晚期猿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演化阶段。目前我们正在以10个课题组进行综合研究，将于明后年发表研究报告。可惜先生未能看到这批资料，便过早地仙逝，先生得知这一喜讯一定会高兴的。另外，毕业的研究生于1986和1987年先后在湖南和安徽发现以大型尖状器为内涵的石器地点近百处。这些发现不仅填补了该省旧石器的空白，而且为研究长江、汉水流域的旧石器文化以及它们和我国南北方旧石器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因而引起同行的重视。

在纪念先生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大会上，说这些事情似乎是不太合适的，但我们深深地知道我们所取得的微小的成绩和点滴的进步，是和先生对我们的谆谆教导，热情的关心，严励的督促和耐心的扶植是分不开的。仅藉这个机会向先生汇报我们的工作。

在缅怀先生不朽业绩的今天，我们也深知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肤浅，距先生的期望还差得很远。我们愿以先生对事业的科学态度，热心培养考古人才和公而忘私坦诚相待的作风为楷模，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培养更多、更好的旧石器考古人才而努力。

裴文中论中国第四纪哺乳 动物学和地层学

韩 德 芬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今天，我们怀着对裴文中先生无限崇敬的心情参加《裴文中教授发现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60周年纪念》大会。

裴文中先生在解放后一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和有关学术领域方面的领导人。在1928年开始的半个多世纪的科学研究工作中，他以毕生精力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第四纪地层学和古人类学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已展现在他发表的140多篇论文和专著之中。先生始终认为对古人类学的研究必需进行综合考察，数十年来身体力行，从而在材料的发现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并为这四门学科培养了一代人材。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其他老一辈的研究人员一道，带领年轻科研人员对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和地层学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值此北京自然博物馆纪念先生发现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60周年之际，重温先生在以上学科方面的重要发现和研究，都可以看出对我国第四纪有关研究的历史进程产生的巨大影响。

由于与会同志已分别从其他方面讲述了先生的事迹，这里仅就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和地层学简要介绍先生的学术贡献。诚然，本文所述只是全豹中的一斑。

从30年代起至80年代，裴文中先生在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和地层学的研究中有不少力作，概括起来有如下主要内容：在华北，研究了周口店几个重要的人类和文化遗址的哺乳动物群和有关地层以及丁村人动物群；在华南，研究了资阳人动物群，在此之前已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对广西更新世洞穴堆积的哺乳动物群的调查和系统研究；并在综合研究我国更新世丰富的哺乳类化石的基础上，陆续论述了中国古人类生活时期的自然环境，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群的地理区划以及地层划分等。下面将把先生论述的中心思想、意义作一简述。这里仅仅是个人的理解和体会，不当之处还望大家指正。

在华北方面，先生在30年代至40年代主要研究周口店第5地点、第1地点、第15地点、山顶洞和第13地点等。在这些地点之中我们挑选其中一部分来看看先生的论述。先生研究的周口店第1地点食肉目是在材料增多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类化石曾在1928年由师丹斯基研究并发表论文，但当时记述的种类较少，仅8个属、种和未定种。重新研究的食肉目化石包括21个种类之多，根据绝灭种和现生种的比例几乎是相等，以及食肉目动物的进化关系，认为周口店的食肉目动物的进化阶段是介于泥河湾和萨拉乌苏